

道符医用源流与治病种类疏证

张宇, 贾春华*

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,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1 号, 100029

摘要 以道符最初应用于医学之情况为起点, 梳理道符所治疾病种类在古代医学史上的发展脉络, 并通过统计道符主要针对的疾病种类, 总结道符所治疾病可分为两类, 一类病种具有传染性强、致死率高、病因神秘等特点, 另一类则为病情轻浅之病症。其所治病症或危重或轻浅两端分布, 值得进一步研究。

关键词 道符; 道医; 道藏; 病种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将汉代医学分为“医经、经方、房中、神仙”四家, 汉代哲学思想兴起, 医学与阴阳五行学说相互融合, 建立起自身的体系, 并藉此逐渐摆脱巫术的影响, 演变为医经与经方两家。然而巫术体系之残余并没有随之消亡, 而是同样接受了新兴学说的改造, 演变为神仙家。东汉末年, 道教初兴, 主要吸收了神仙、房中两家的内容, 并结合医学的其他门类, 逐渐发展形成独特的道医体系^[1]。

1 道符医用之始

《三国志·张鲁传》记载“鲁据汉中独立, 行五斗米道。以符水治病, 致米一斗, 疾苦立愈, 奉者甚众”。一方面, 这一时期道教虽重视道符治病, 但尚未完全与术数等后世具有道教特色的方术相结合, 其所书道符巫鬼遗风甚重, 未形成独立的体系, 故此时的道符适用范围宽泛而模糊, 往往是一符通治百病^[2]。另一方面, 道符的功能是以祈求特定神明的力量为基础来实现的^[3], 故此时道符适用范围模糊一定程度上也与当时道教神系的缺失有关。以西汉文物《五十二病方》为例, 廖育群^[4]对其中涉及禁咒治病的条文进行了统计, 发现其祈求力量的对象首先是动物, 其次才是神明, 且所用神明并不十分抽象, 说明至少到汉代为止, 道教所崇拜的对象还多以现实世界的事物为原型, 尚未开始大规模制造偶像。

2 道符医用涵盖病种

魏晋南北朝时期, 道教得到士大夫阶层的支持, 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, 灵宝、上清等道派先后出现, 《三皇》《上清》《灵宝》等著作亦广为流传。道教在治病救人的过程中不断吸纳历代影响力显著的人物, 如药王孙思邈、武圣关羽等, 以充实完善自身神系。至南北朝时期, 寇谦之、陆修静等着手改革道教, 并整理搜集道教文献以编纂道藏。这一时期, 医行道符虽然从名义上来说仍是通治百病, 但在文献记载中其主要应用范围已被局限于几大类疾病之中。如盖建民^[5]对南北朝道经《太上洞玄灵宝素灵真符》中出现的治病道符进行统计, 发现其主要被应用于瘟疫、卒中、心腹痛、痢疾、疟疾等方面。此外, 于赓哲^[6]对唐代医书《备急千金要方》《千金翼方·禁经》和《外台秘要》中的咒禁疗法进行分析, 发现其主要涵盖的疾病种类有疟疾瘟疫、妇产儿科、虫兽所伤、耳鼻喉科、痈疽疔疮、外伤、精神疾病, 其中疟疾瘟疫的出现频率最高。

道教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扩充自身神系, 终于在宋明之际形成了一个特别的道符医用的机构——天医院。成书于宋元时期的《灵宝领教济度金书》中有大量关于天医院的描述, 书中将天医符分为召风科、召大方脉、召眼科等十三科, 其所治病种已全面涵盖了传统医学的所有分科, 故有道门称天医符可“疗治世间男、妇、小儿诸般内、外疾病”。我们对宋代成书的《医学祝由十三科》中出现的 361 张道符进行统计, 结果出现频率较高的有治痈肿疮毒符 38 道、治虫兽外伤符 35 道、治

* 通讯作者: jiachunhua125@163.com

痛症符 28 道, 其余道符则涵盖了妇、男、小儿等内、外各科杂病, 可见出现频率较高者多为日常生活中常见病症。

然而与其在理论上达到顶峰相反, 现实中宋明以后道符在医学上的应用范围开始急剧退缩, 甚至逐渐绝迹于文献记载, 如明代虞抟《医学正传》言“或问: 古者医家有禁咒一科, 今何不用? ……邪术为邪人用之, 知理者勿用也”。由此可见, 与汉唐魏晋时期不同, 此时人们已摒弃了道符在内的各种巫术疗法。一方面, 与传统医学思想的进步有关; 另一方面, 据于赓哲^[5]推测与宋以后儒医阶层兴起, 奉行“子不语怪力乱神”有关。

3 道符医用病种举隅

3.1 注病

注病是包含了各类传染病及诸多杂病在内的一个宽泛混杂的病名, 道藏所载注病中最常被提及的当属鬼注、尸注、劳注等。《肘后备急方》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, 曰“尸注、鬼注病者, 葛云即是五尸之中尸注, 又挟诸鬼邪为害也, 其病变动, 乃有三十六种至九十九种, 大略使人寒热, 淋漓, 怵怵默默, 不知其所苦, 而无处不恶, 累年积月, 渐就顿滞, 以至于死, 死后复传之旁人, 乃至灭门”, 其中所言注病大概等同于后世所谓的“传尸痨瘵”。

对于注病的发生与传播, 道教在吸收世医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其“皆由虚损得之, 病源从肾起, 传之于心, 则惊悸少气, 梦见先亡, 故本经云: 先亡复连是也”, 即病生于虚损而传易于宗族之间。道教对此给出的解释是祖先作恶累及后人, 因此需要施符作法以“承兹符命, 解释冤仇”, “抚慰亡人”, 达到祛病的目的。

3.2 疟疾及各类传染病

疟疾是经按蚊叮咬传播的、由疟原虫引发的一种传染病。疟疾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威胁民众的最主要疾病之一, 我们可以在中医文献里发现很多治疗疟疾的方法。然而古人并未认识到疟疾与虫媒传播有关, 如《素问·疟论篇》论述疟疾病因为“夫疟疾皆生于风”, “夏伤于大暑, 其汗大出, 腠理开发, 因遇夏气凄怆之水寒, 藏于腠理皮肤之中, 秋伤于风, 则病成矣”。直至清初喻嘉言提出“疟邪”一说, 才将疟疾病因与外感六淫区分开来^[6]。但这些理论均未认识到疟疾的传染性, 对防控疟疾并无帮助, 民众仍然对疟疾抱有

极大的恐惧。道教关于疟疾的病因论述则恰好满足了安抚民众的需求, 他们认为疟疾是由“疟鬼”导致的, 如《备急千金要方》就载有治疟符咒文书。除疟疾外, 古代尚有多种传染病流行于世, 古人统称之为“天行病”或者“温疫”。中医学认为其病本于六淫或是“戾气”, 而以道教的视角来看, 瘟疫是由瘟神、瘟鬼等散播疾病导致的。

3.3 伤科及外科

伤科是针对包括虫兽、金刃所伤等在内的外伤进行治疗的一门医学分科。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, 民众终日劳作不休, 又多逢连年战乱, 伤科应用机会较多, 自然比较重要。此外, 古时毒虫猛兽袭击人类的事情也多有发生, 道士们对此做出反应以满足人们的需求, 比如东晋葛洪在《抱朴子·内篇》中记录了仙人陈安世所传入山辟虎狼符, 还专门提到了佩印法。

外科疾病一般指包括痈疽疔疮等在内的各种皮肤病, 此病多因五脏蕴毒, 饮食不慎, 或感受四时不正之气, 或由昆虫咬伤所致, 其发病迅速, 易引起继发感染, 而以疔疮走黄为最烈者^[7]。徐灵胎在《洄溪医案》中多处提到“流注”“痈疽”“发背”等外科疾患, 用词屡见“病极危险”“危在顷刻”“诸医束手”等, 说明体表脓肿不仅常见, 而且对古人来说是一种极其危险而难治的疾病。如前文所述的道书中均记载了大量治疗痈疽疔疮的符咒, 在此不再赘述。

3.4 妇产及儿科

妇女生产常出现产后大出血等并发症, 故而在古代一直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情。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写本《新菩萨经》中即将“产生死”列为诸病第三^[8]。道教将生产的危险归结于触犯禁忌, 并创立了许多符咒以作顺产之用, 如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·产前将护法》中便有道符的应用。而对于儿科, 道符的应用则多局限于小儿夜啼、受惊等病种。传统医学与道教均认为, 小儿魂魄未定, 易受惊吓, 区别在于, 传统医学多采用安神重镇的药物进行治疗, 道教则通过施法以收惊、收魂等方式来解决问题, 此类道符简单易学, 在民间广泛传播。

4 道符医用病种特点

4.1 传染性强

东汉《释名》将“注病”解为“一人死, 一人复得, 气相灌注也”, 明确提出了注病的传染性。然而注病的传染仅限于宗族内部, 其传播强度

较之疟疾、寄生虫病等传染病则远远不如,如《伤寒论》序文所述“余宗族素多,向逾二百,自建安以来,犹未十年,其亡者三分之二,伤寒十居其七”。而对于道教团体的活跃,史书竟罕见地没有对此类所谓的“妖巫”进行抨击^[8],可见当时疫疾传害之烈。实际上,道教团体正是值汉末瘟疫肆虐之际,借散布医药、符水疗病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而吸纳教众稳步发展;反过来,传染病也对道教医学的致病观、信仰体系甚至是道派的创立与传承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

4.2 致死率高

纵观上文所述之常见病种,如尸注、鬼注(即癆瘵,约属于现代的结核病范畴)、疟疾之类,在医学高度发达的现代,这些疾病若不及时救治往往能致人死亡。即使如外科脓肿、妇产之类对现代医学而言的“小病”,在当时亦常令医者束手而导致较高的致死率。

4.3 病因神秘

一般认为,在医学水平低下时人类对自然科学认知不足,无力与疾病抗争,若出现无法解释的现象便归咎于神明,比较典型的如道教注鬼、疫鬼、疟鬼等观点的产生。随着医学认知水平的提升,这些论点逐渐没落,此于“注病”体现得尤为明显。阅览隋唐道藏发现,注病被分为肾注、哭注、食注、鬼注等数十上百种类,然而到了宋代,道藏中注病的范围急剧收缩,很多名目已难觅踪迹^[9]。一方面,医学理论的进步势必带来疾病分类的精细化,一些描述模糊的病名自然会被剔除;另一方面,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完善足以将某些病纳入其解释范围,并给出有效的治疗手段,如食注、水注等,在中医理论中可用食积、水饮等进行解释并治疗。

事实上,道符也确是作为针药之外的一种补充疗法出现在医学里的,道教称其能“救疗久病困疾,医所不能治者”。以道藏中常见的疟疾和瘟疫为例,范行准^[10]认为,“由于知识的限制和恐惧的心情,那时的技术解决不了季节性的传染病及一般传染病的蔓延,于是便从他们所认为已经明白传染病的原因——鬼神这一问题上着手,而发生种种迷信的活动”。由此或可解释古时的人们是抱有怎样的心态,以及为什么去创立这些法术的。

4.4 病情轻浅

如前所述疾病,或传染性强,或致死率高,或两者兼而有之,故道藏将其列为重点进行论述。然而另有一些疾病,其病情轻浅却于生活中常见,道门虽未对其作重点论述却广泛见于道藏记载。儿科和伤科只是其中常见的一部分,更多的则是各种庞杂而难以完全分类的疾病。仍以宋代道书《医学祝由十三科》为例,该书以相当的篇幅记载了中暑、头痛、喉痛、咳嗽、胃痛、不思饮、夜梦遗精、水泻肠鸣等数十种杂病对应的道符,且事实上这些病症才是道士大多数情况下应用道符针对的对象。

5 结语

时至今日,许多对人类生存威胁极大的疾病已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而逐渐消亡,疾病的机理在不断地被阐释,其神秘性也随之消失,道符治病似乎已淡出大众的视野,理应随着时代发展而被抛弃,然而其在民间仍有应用,且其所治病症或危重或轻浅两端分布,这一系列问题,仍需今后进一步研究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刘阳. 汉代方士医学研究 [M]. 北京: 中国中医科学院, 2014: 4-5.
- [2] 盖建民. 道教符咒治病术的理性批判 [J]. 世界宗教研究, 1999(4): 70-71.
- [3] 刘仲宇. 道符溯源 [J]. 世界宗教研究, 1994(1): 1-11.
- [4] 廖育群. 中国古代咒禁疗法研究 [J]. 自然科学史研究, 1993, 1(4): 375.
- [5] 于康哲. 唐代医疗活动中咒禁术的退缩与保留 [J].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(人文社会科学版), 2008, 47(2): 65-67.
- [6] 马芸. 医治与神治: 道教传染病治疗研究 [D]. 济南: 山东大学, 2017.
- [7] 沈曙明. 疗疮证治刍议 [J]. 江苏中医药, 2003, 35(4): 37.
- [8] 于康哲. 《新菩萨经》、《劝善经》背后的疾病恐慌: 试论唐五代主要疾病种类 [J]. 南开学报, 2006, 39(5): 68.
- [9] 徐宇. 汉末魏晋的瘟疫及其与早期道教嬗变关系的考察 [D]. 南京: 南京师范大学, 2018.
- [10] 范行准. 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 [M]. 上海: 华东医务生活社, 1953: 3.

(收稿日期: 2019-10-17; 修回日期: 2019-11-20)

编辑: 黄 健